

总 序

庄锡昌

大约在一百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特宗教的神秘兮兮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五十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五十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不时还传播一些被严重歪曲的消息报导，起了误导的作用。因此，原本不应该如同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之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的交流大大加强，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别后是否无恙；然后则是急切的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 年 10 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短短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会议参加者、著作撰稿者都十分踊跃。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以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

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颇为重要。

其三，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姻缘。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的历史遗产。

其四，韩中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以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的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的、全面的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等方面。现在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表示愿意负责丛书的出版工作。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必将会有所裨益。

1997 年 10 月 14 日

绪 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三一运动为起点的朝鲜独立运动同为 20 世纪远东的伟大革命运动。由于两国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源远流长以及近代共同遭受日本侵略，面临类似的革命任务，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朝鲜独立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的研究却显得非常不够，不仅缺乏系统性，基本的史料没有得到挖掘和整理，不少领域的研究尚为空白，而且深深打上了冷战时代的烙印，在科学性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中国与朝鲜、韩国关系的均衡发展，朝鲜半岛北南关系的走向缓和，以及各方档案资料的不断披露，已使我们有可能对于该课题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史料的梳理和初步的研究。该项研究对于推进近代中朝关系的研究和发展，既有历史的和理论的意义，又有政治的和现实的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也给朝鲜人民的反日复国斗争注入了活力，三一运动开始了朝鲜独立运动的新时代。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关内早期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应从俄国十月革命对于中朝两国的影响谈起。朝鲜三一运动席卷朝鲜半岛之时，正值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诞

生，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已以满腔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着这一场民族革命的兴起。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刊物《每周评论》先后以《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生气与杀气相冲，公理与强权苦战；且看最后到底谁胜谁败？》为题，详尽报道了朝鲜三一运动，后来成为中共首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在该刊物上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中国的李完用、宋秉竣是谁？》的社论和短评，称颂“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历史的新纪元”，并向中国人发出警世之语：“我们中国已快到朝鲜的地位了，你可晓得那李完用、宋秉竣是谁？”^[1]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接触过朝鲜革命者，中共建党前夕，他和另一著名革命家何叔衡一起在湖南长沙和朝鲜革命者共组“中韩互助社”，并分任通讯部主任和宣传部主任。^[2]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施洋也和朝鲜革命者在汉口创办“中韩国民互助社”。^[3]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活动中，与在上海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也有某些联系。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至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革命者在中国关内进行的独立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呈现着多方面的特点。首先，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由党的基本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学说、共产国际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和国际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本国革命的共同理论基石，也是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奋斗的必要前提。1922年1月，中国代表39人（内中共代表14人），朝鲜代表52人（内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42人）加上日本代表73人、蒙古代表14人等，一起参加了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的残暴和无耻，明确提出中国、朝鲜和

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与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勇敢地承担起向世界帝国主义开战的重任。^[4]会议期间，中朝两国的革命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增进了互相了解，奠定了共同奋斗的基础。

对于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有所阐述和发展。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并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东方弱小民族革命者关系的原则立场。会议通过的《宣言》，不仅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达到解放全世界的目的，而且高度评价日益高涨的朝鲜独立运动，指出“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强调中国的反帝运动一定要并入朝鲜以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5]1926年11月30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太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讨论中国革命时发言，对于两者的关系也作了精辟的阐述：“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中国革命运动最广泛、最积极的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朝鲜广大人民群众中博得了热烈的同情，使他们受到鼓舞”；同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革命“也可以指望得到朝鲜人民，特别是朝鲜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积极的援助，他们可以领导朝鲜民族革命运动从后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就能使中国革命易于取得胜利”。^[6]

中国共产党对于朝鲜国内发生的重大革命运动都作出了及时的反应。1926年朝鲜发生“六十”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向导》第 160 期迅速发表署名文章《朝鲜之大示威运动》，详尽报道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这一革命运动，并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次大示威运动比三一运动有很大的进步。“三一运动是原始性的，幻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其所表现是本国落后的资产阶级之思想，这是‘跪求运动’。这次大示威运动虽然范围没有三一运动那样广大，但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又是受朝鲜共产党首领的指导，联合民族革命团体共同奋斗，而且没有以前的幻想，反有确定的政纲和通俗的适合群众要求的政治口号”，这表明朝鲜民众在“经过三四年工农非政治的经济斗争及民族革命团体完全沉寂之后”，“现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治斗争的新时期”。文章进而指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与日本革命无产阶级运动和中国及一切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的，既然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革命者和朝鲜的革命者自然容易接近，这两国革命运动的联络愈密切，则其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必愈有成效。”6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枢字第62号通告，指出“此次汉城的骚动，实含有严重的革命意义”，“被奴隶的韩国人民已开始做猛力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对于韩国人民这种英勇的奋斗，应该给以精神上的声援”，要求各支部负责人“即用各种社团的名义拍电汉城韩国民众表示援助”“不能去电者亦须用快函代电”；应特别表明中韩人民共同携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谋世界民族革命之成功之诸重要意义。^[7]7月12日，中共中央更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高度评价朝鲜“六十”革命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援，指出它和最近发生的里夫及叙利亚的对法战争、埃及的排英运动、阿拉伯的政治罢工、土耳其联结苏联反抗英国侵夺莫塞尔等，“足以使帝国主义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等。^[8]这些文章和声明文件向中国人民正确地宣传和介绍了朝鲜革命运动，起到了鼓舞中朝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双重作用。

1929年底，朝鲜爆发了以“光州事件”为标志的反日斗争风

暴，形成朝鲜革命运动史上的又一高潮。12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64期以“朝鲜斗争消息”为题详细报道了该事件，并发表评论《欢迎朝鲜的“五卅”》，以满腔的热情颂扬这一运动是“全朝鲜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千八百万朝鲜人正在过着自己的伟大的‘五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根据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科学地预言了该运动的发展趋势和走向，要点是：（1）这一伟大事变是朝鲜全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式大爆发，无论这一事变本身暂时是胜利或失败，运动的向前扩大和深入是毫无疑问的；（2）当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以政治罢工来作为运动前锋时，朝鲜的“实业家”（土著资产阶级）及“名士”们不可免的要走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本国王公地主联盟的道路；（3）幼稚的朝鲜共产党在这一事变中可以发展成为群众的政党，其政治威信与领导力量，要随着事变的扩大深入而增高；（4）随着民族革命高潮而来的，一定是本国阶级斗争的加剧，随着工人阶级斗争影响而来的，一定是广大农民的反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5）这一事变一定要摇动东三省民众及台湾民众反日运动的高潮，中日韩三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汇合起来，一定能根本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金玉良言”，对于朝鲜革命者来说，无疑起着重要的指导性的作用。次年2月1日，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也发表《援助朝鲜革命宣言》，称颂“光州事件”不但是朝鲜革命的一个浪潮，也是全世界正在复兴的革命波涛中的一个，号召中国的青年兄弟们实行“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极度地发展我们的反帝运动”，“给朝鲜的兄弟们以最大力的帮助！”^[9]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还表现在旅居中国的大批朝鲜革命者以无私的献身精神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与中国革命者并肩战斗。从组织体系上讲，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中信奉共产主义的一派同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关系十分密切，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秘密到公开、由公

开到秘密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共产国际对待中国和朝鲜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经历了某些变化，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待朝鲜独立运动的方针政策以及朝鲜革命者参加中国革命的方式不断有所变化。在国共合作时期，大批朝鲜革命者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行列。他们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和蒙古、印度等被压迫民族民众代表举行大会，发表声明，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派出大批优秀青年进入被称为“东方各弱小民族学习革命方略及战术的总机关”——黄埔军校学习，根据第 1—5 期的统计，共有 34 名朝鲜籍青年成为军校学生。^[10]随后他们又参加了巩固广东根据地的战斗和北伐战争，他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的大地。

国共分裂后，信奉共产主义的朝鲜革命者依然与中国共产党人生死与共，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起义，成立“广州公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朝鲜革命者 150 余人与中国战友共举义旗，并肩战斗，在沙河战役中坚持战斗到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后来，广州人民为此修建了“中朝人民友谊亭”，起义领导者叶剑英撰写碑文，称颂他们“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11]起义失败后，金山等 15 位朝鲜革命者随同起义军撤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相结合，继续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金山曾被任命为海陆丰革命法庭的 7 名成员之一。^[12]

1926 年 4 月，朝鲜革命者曾在上海建立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直属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次年 9 月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示，停止活动，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编为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国支部。自此在组织系统上，列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序列。据 1928 年 7 月《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支部状况统计表》记载：代号为“蒲石”的韩国支部有 24 名党员，并被评价为“负责人好，有

能力”。1932 年 4 月，中共法南区委举行党代表大会，韩国支部代表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决议强调该支部的特殊性，指出要“帮助他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完成他们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该支部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韩人支部、中国革命济难会上海韩人分会、上海韩人反帝同盟、上海韩人苏维埃之友、上海韩国革命妇女会、上海韩人革命青年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革命团体，为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还曾建立若干过临时性机构，如上海韩侨民拒缴民团税委员会、上海韩人五卅纪念准备委员会、韩人拥护红军募捐委员会、上海韩人“八一”筹备委员会、上海韩人反对牛兰氏无期徒刑委员会等，并先后创办了《三一战线》、《反帝战线》、《互济运动》、《无穷花》等革命刊物。朝鲜革命者颁发的重要文件有：《纪念朝鲜三一运动宣言》、《纪念巴黎公社诞生 51 周年宣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宣言》、《为抗议日帝擅自逮捕韩籍亡命者告全上海朝鲜居民同胞书》等等，并曾决议援助 1 架飞机给中国工农红军，飞机定名为“上海工人号”。^[13]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然，如同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这个时期的朝鲜革命者也曾受到李立三、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和指挥，出现一些错误的举动，使朝鲜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对外国侨民及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革命者关系的又一侧面。1934 年 1 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正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民族问题上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成就。其第 15 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运动而受到反动派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

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第 17 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在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14]中国共产党人据此妥善处理与包括朝鲜革命者在内的各国侨居者和革命者的关系，并为以后新民主主义政权处理相关问题积累了经验。在中国各红色革命根据地，甚至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行列中，到处都留下了朝鲜革命者英勇奋斗的足迹。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比较中国关内地区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1）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侨民不仅在数量上达到 200 万以上（一说 300 万以上），而且居住相对集中，形成一定的聚居区，而关内地区朝鲜侨民完全散居在中国人民之中；（2）自朝鲜亡国以来，移居中国东北的各阶层的朝鲜人前仆后继，在东北地区独立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复国斗争，而关内地区朝鲜侨民的反日独立运动往往与中国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在更大程度上是参加或配合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3）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受总部设在国内的朝鲜共产党中央领导，而在关内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党人则与朝鲜共产党国内的总部没有密切的联系等，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革命者相互关系上的某些特殊之处，有必要单独进行探究。

自 1919 年三一运动起至 1929 年 9 月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决议解散在满的朝鲜共产党组织，朝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止，为朝鲜共产主义派在中国东北单独进行反日复国运动的时期。1925 年 4 月，朝鲜共产党和高丽共产青年会在汉城成立，分别成为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支部。1926 年 5 月，该党在中国东

北宁安县宁古塔建立满洲总局，并将中国东北划分为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先后设置区域局；同时，高丽共产青年会也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总局，这样就将多年来在中国东北逐渐发展起来的分散的朝鲜革命力量团聚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反日复国运动的有严密组织的革命队伍。

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东北设立满洲省委，在时间上要晚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建立。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立即派员奔赴朝鲜革命势力较为强盛的东满地区，在中朝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开展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东北的朝鲜革命运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28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指出：中国东北是少数民族杂处的地区，“朝鲜民族有 300 万以上在满洲经营农业，与内外蒙接近的地方则完全为蒙古民族的范围”，提出处理蒙、韩等少数民族的三点指示：（1）根据“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原则，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2）少数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须由劳苦群众取得，同时揭破其上层阶级的妥协性；（3）在一般工农运动中以共同的口号联合韩、蒙工农群众一致反对资本家地主，并统一其组织（工会、农会）等，要求省委注意调查少数民族的情况报告中央。^[15]7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通过《民族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的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决议“委托中央委员会于七次大会之前，准备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程并加入党纲”。^[16]

据此，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于中国东北朝鲜侨民、朝鲜革命运动以及朝鲜共产党的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192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人支部书记玉真向中共中央送交《东三省韩侨情况报告》，内列韩侨的户口和移住的原因、移住农民的痛苦、民族

主义革命团体的状况、青年运动的兴起、朝鲜共产党和共产青年会的满洲总局五个部分，尤对朝鲜独立运动各派状况作了分析。报告指出：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民族主义革命团体，“志在训练军事人才”；“时时渡江到本国境内，袭击倭军警”；“到现在最有历史、最有势力的，是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但是他们的一切经费，都是从农民方面征收，所以穷苦的农民除中国的地主官绅们凌虐诛求以外，又不堪革命党人之暴压的苛捐”。继而指出：由于“时代的推进力”和“韩人青年自动的觉醒”，出现了“努力鼓吹社会主义”的青年运动，“现在南北满洲的青年团体约有 30 多个，力图组织统一的大同盟，不远的将来，可以实现出来”。最后论及朝鲜共产党和共产青年会满洲总局，指出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群众，领导青年运动，总惠各个民族革命团体，向着反日帝国主义协同战线进出”，但由于“1927 年 10 月东满区域局代表大会在延吉开会，被日本军警侦悉，百余同志被逮”，再加上“反动分子在党内另组织所谓 ML 党，破溃党本”，满洲总局已“不成组织”，“成了没有系属”的机关，但党员仍在继续活动，人数也有增加。报告建议：对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编入中国党的组织，恐是当然，但是照顾民族的特别关系，虽为中国党所属，也应取特别组织的办法”等。^[17]7 月 25 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朝鲜工作委员会成员的江宇也向中共中央送交《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内列韩侨之移住沿革概略、住满韩侨的革命情势、结论三部分。报告着重剖析了中国东北朝鲜侨民的基本状况：（1）200 万韩侨中 85% 以上是佃农，经济生活尚在封建关系基础上；（2）日本帝国主义的间接且直接的压迫；（3）中国军阀政治上经济上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4）地主的无饷的压迫与榨取；（5）物价非常之昂贵（例如食盐等）；（6）经济之流通很困难；（7）同阶级的中国农民的侮慢与不理解；（8）反日本意识巩固与极热；（9）光复祖国的思想很深切；（10）依诸资本的被榨取；（11）苛捐杂税的无限制等，

由此提出了韩国革命团体的指导方针和对于农民问题、训练问题等的策略。^[18] 这些重要的调研报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侨民及朝鲜独立运动状况的认识水平，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关系的大调整做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朝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关系的大调整是由共产国际决定进行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中国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这不符合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而朝鲜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非常尖锐，也引起共产国际的严重不满；再加上日本军警在中国东北对于朝鲜共产党人的二次“大搜捕”，^[19] 导致朝共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处于涣散状态。共产国际于 1928 年 12 月决定解散在中国东北的朝共组织，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满洲组织。这一决定的历史是非暂且不论，然而，当时对于中朝两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却都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对于朝鲜共产党人来说，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即“把过去以朝鲜革命为目标转变为以中国革命为目标，把过去的种族对立转变为阶级对立，把过去无原则的派争转变为有原则的阶级斗争，把过去的和平运动转变为斗争的运动”。^[20] 朝鲜共产党人要实现这个转变并非易事，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时期尚早论”，认为“在朝鲜共产国际支部重新组成以前，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认为“满洲的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微弱，现在加入是不利的”等；一是主张“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朝共总局）还要继续保持下去”等。为了解决这些认识问题，朝鲜共产党内“强有力地无情地开展理论上的政治斗争”。^[21] 延至 1929 年 9 月 20 日，才由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第十次扩大会议作出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明确决议。1930 年 3 月 20 日，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正式发表《解散宣言》，宣布代表党内 430 名党员，解散原来惟一组织——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并指出：在中国东北的朝鲜

工人大众要想从顽固的资本家的封建压迫、剥削中求得解放，只以“朝鲜的独立”为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只有通过中国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得到本身的解放，这是朝鲜工人、农民大众惟一斗争的途径和解放的路线；在这样的经济、政治基础上，按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同时从朝鲜发展过来的各派组织应彻底解散。宣言号召朝鲜各派共产主义者“从朝鲜运动中撤出来！”“抛弃延长朝鲜的组织！”“解散各派组织！”“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斗争支援朝鲜革命！”等等。^[22]自此，在中国东北战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正式列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序列，成为中国东北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接纳如此大数量的朝共党员进入党的组织之内，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组织上，中共满洲省委和所属各特委成立少数民族部，加强对于原朝共党员的领导。1930年4月，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国东北韩人工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韩人革命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农村（如东、南、北满）的工作完全偏于韩人方面。中国农民的工作刚开始，同志的数量90%以上也是韩人。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为了解韩国群众的情况，正确地领导他们的运动起见，已在省委之下成立少数民族部，专门讨论韩人工作问题。”同时，报告还指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翻译问题，一是省委文件都是汉文，逐级传达，因翻译的关系，有时把文件意义弄错，以致在策略路线上发生问题；二是省委的文件往往要1个月后方能传达到支部，每每失了时效，省委的党报也无法传达到群众。要求批准成立省委翻译科，并解决有关人员和经费问题。^[23]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满洲工作大纲》，肯定了满洲省委的做法，指出：“党的省委之下应当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或者暂时只有韩国人，就简单的称为韩国委员会，选拔韩国人干部，计划出版韩国文的刊物和宣传品”，并要求

满洲省委收集一切有关韩国共产党的消息材料，迅速地寄达中央转到共产国际去解决，经过正当的组织路线，切实地帮助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24]

关于朝共党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朝鲜共产党内的派别纷争。中国共产党认为：“韩同志中历史上派别斗争情形复杂，所谓一、二、三派，其间是没有是非的。所以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必须特别审慎，不仅听他们话，而主要是看他们行动与斗争中表现如何。绝不可听某一派的话，以为根据。”^[25]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朝共代表李青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对于在满韩人组织问题，因为语言、习惯、风俗的关系，成立特别的机关，直隶于省委，或称韩人总局或称民委，而指导全满韩人的革命工作”等，为中共中央拒绝，并指出这种主张“事实是想保存在中国党内韩国同志独立特殊的组织，这不合乎我们承认韩同志加入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处理原则是：不承认韩国党过去一切派别小组织，不是团体的加入，而是个别的加入；只有承认中国党党章，服从中国党领导，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者方可加入；加入中国党的韩国同志便是中国党员，按照组织系统，编入各地支部，在没有中国同志的地方，韩国同志的支部一样接受各级党部指挥，在中国党内不存在韩国同志的独立特别的组织；消灭韩同志中派别小组织斗争，特别是斗殴等情形，并防止他们加入中共后继续小组织活动；不管他们原属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不能积极斗争，不放弃小组织成见，绝不让其加入，已加入者也必须开除等。^[26]中国共产党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原朝鲜共产党内的派别纷争问题，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党员能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中国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朝共产党关系的大调整带来了积极的成果。大批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中朝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战斗，有利于粉

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朝人民关系的挑拨与离间，而且大大增强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将原先朝鲜革命者组织的零星的反日斗争和反抗中韩统治者的斗争升华到中朝革命者联合战斗的更高级的形式。首先，中共东北党组织成功地揭露和制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离间中朝关系的阴谋。由于万宝山事件、中国华侨在朝鲜遭惨杀事件以及“九一八”事变等接二连三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中国东北挑起中朝民众的全面冲突，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表明了自己的正确立场。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指出：你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被驱逐到满洲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却以朝鲜人民会、相爱会、救济会、金融部等走狗机关来剥削、欺骗你们，并且不遗余力的来利用你们做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呼吁亲爱的朝鲜兄弟不要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民保护”所陶醉，不要相信他们的占领满洲会给你们带来生活上的安定，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号召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的工农兵劳苦群众兄弟们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自身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自决”的政纲，一定保障革命成功后，你们在满洲的绝对平等的政权等。^[27]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挑拨而在中朝民众间投下的互不信任的阴影逐渐消除，中朝革命者在艰苦的反日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这对于日后中国东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坚持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国东北地方党虽然仍认为“援助韩国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的实际任务之一”，“派韩国同志回国，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指出“东满过去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须继续进行，南满应立即开始准备进行这一工作”，“派去韩国工作同志的任务按照中央草案所指示的执